

敦煌写本《晏子赋》的同卷书写情况

李文洁

一、敦煌《晏子赋》的书写情况

刻本经由制版印刷而成,书版已然规定了刻印的内容和版式。然而作为写本,由于书写过程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文献中的内容有可能由不同的书写者在不同的时间完成^①。敦煌写本中的相当一部分就非一次定型,由不同书写者抄录的若干文献同时出现于同一写卷的现象是经常出现的。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几种此前未有流传的俗赋——《燕子赋》、《韩朋赋》、《赵洽丑妇赋》、《晏子赋》,以及《𪛗𪛗新妇文》等^②。这其中《晏子赋》与其他文献同抄一卷的情况最多,因而我们以《晏子赋》为研究对象,以期从书写形态的角度来了解敦煌俗赋的性质。

迄今已知的敦煌本《晏子赋》共有 9 件,它们是:英藏的 S.5752、S.6332,法藏的 P.2564、P.2647、P.3460、P.3716、P.3821,俄藏的 д x 00925 (新号 1483) 和国家图书馆藏《晏子赋》写卷 BD00207 (字 7)^③。这里首先对其书写状况作一描述^④。

①林聪明《谈敦煌文书的抄写问题》一文就敦煌文书的性质、内容列举了敦煌写本的多种书写情况。见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页 293-299。

②伏俊珪《敦煌赋及其作者、写本诸问题》认为《𪛗𪛗新妇文》“因其对话体、故事性和大体押韵的特征,可以说是典型的俗赋”,本文从其观点。见其《敦煌文学文献丛稿》,中华书局,2004,页 91。

③施萍婷、邵惠莉《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列其目录,而作品辑录如刘复《敦煌掇琐》、王重民《敦煌变文集》、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伏俊珪《敦煌赋校注》、张锡厚《敦煌赋汇》、黄征等《敦煌变文校注》等书则未收国图藏卷的录文。现将 BD00207 (字 7)《晏子赋》录文附录本文后。

④本文对各个写卷的描述,依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原卷和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文献的图录。见《英藏敦煌文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俄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1996。

S.5752

存1纸,首全尾残。双面书写。正:《百鸟名》,“晏子赋一首”(仅有篇题),《丑妇赋》,《百鸟名》。背:《百鸟名》,杂写。

正面文献均不完整,由二人书写。无天头、地脚、界栏。卷首《百鸟名》、“晏子赋一首”6行为一人书写;均有首题;长体细楷、文字歪斜,墨色淡且浓淡不一。之后的《丑妇赋》与《百鸟名》为另外一人书写,均为片断;《百鸟名》有首题;二篇字体为端润楷体,大小一致工整,但用墨浓淡也不一致。

卷背笔迹与正面杂写的《百鸟名》、“晏子赋一首”相同。无天头、地脚、界栏。背面的《百鸟名》因残损缺开头部分,且未抄完。最末有“乙未年六月十五日立契莫高□百姓□□定为”字样。

S.5752 中的所有文献均不完整,各篇格式不一,书写也不够工整,只可视为习写。

S.6332

卷残,单面一人书写。存《晏子赋》35行(自“昔者齐晏子使”,迄“子,贫者是”),首题“晏子赋”。楷体,字形一般。前半部分尚工整,后半部分渐潦草,至最末有1行与赋文无关的倒字,有懈怠之嫌。

P.2564

共7纸,首全尾残。双面书写。正:《晏子赋一首》,《齟齬新妇文一本》,《太公家教壹卷》。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略抄》,《百行章疏》,白画鬼神(线描头像),乙酉年五月八日残契约、辛巳年二月十日杂帐(倒写)。

正面每纸28行,行19-23字不等,无天头、地脚,有界栏。全部文献完整,由一人书写。格式方面,每篇皆有首题、尾题。长体细楷,字迹流畅,文字大小基本一致,用墨浓淡稍有不。《太公家教》有涂改、行间校加字。

背面书写者与正面不同,而写于最末的“乙酉年五月八日残契约”、“辛巳年二月十日杂帐”笔迹潦草,无法确定书写者。字拙,大小不一,用墨浓淡不一,有倒字,文字之上还有大字书写的杂字。

P.2564 正面文献完整、格式统一、文字大体端正,整体上认真规范;《太公家教》中的涂改和行间校加字,亦可表明在当时使用时对文献内容有较高要求。卷背的线描头像、倒字、杂字则显得殊为随意。

P.2647

首尾全,共5纸。双面书写。正:《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背:《晏子赋》、《五更曲》(妇思夫者)、《千字文》习字。

正面每纸29行,行30左右。为一人书写。经文首尾俱全,末有“李加兴写”字样。有天头、地脚、界栏,字小而密,从行格及字体来看,当为吐蕃时期写卷。

背面为另一人书写,文献均不完整,其中《晏子赋》首全,迄“国内吾人,遭”。无天头、地脚。无首题、尾题。楷体,字形一般。千字文习字在各文献中穿插出现,并有倒写。

P.2647 正面文献完整,为正式书写的经卷。背面文献不完整且杂乱无章,书写一般,可视为杂写。

P.3460

现存 1 纸,首全尾残。双面书写。正面为《晏子赋》,背面为杂写。

正面《晏子赋》为一人书写,首全尾残(下讫“榘黑者先”)。无天头、地脚,界栏不明显。有首题,端润楷体,字佳,用墨浓淡一致。篇题下有两个杂写文字,为另外一人所加。背面有几个分散的杂写文字。

P.3460 正面的《晏子赋》由于写卷残损,不知是否抄写完整,但从行格及字体来看,书写认真规范。

P.3716

共 10 纸,首稍残、尾全。双面书写。正:《瑜珈师地论手记》(首残)。背:《新集书仪一卷》,《王梵志诗一卷》,《晏子赋一首》,《赵洽丑妇赋一首》,《百鸟名》。

正面为一人书写,文献基本完整(卷首稍残)。行楷,字小而密。格式严整,当为正式抄写的佛经^①。

背面为另外二人书写。《新集书仪》为一人,首残,末题“天成五年庚寅岁五月十五日敦煌伎术院礼生张儒通写”字样^②,字体粗拙,行列尚整齐,界栏不明显。后 4 种文献为另外一人书写,有界栏、上下边栏,端正行楷,用墨浓淡一致。《王梵志诗》、《晏子赋》、《赵洽丑妇赋》均完整,均有首题、尾题。《百鸟名》有首题,仅 6 行,界栏不明显,文字止于距纸边缘 1-2 行处,当为纸张不够而停止书写。

P.3716 的《晏子赋》书写完整、规范,字形亦佳,它与《王梵志诗》、《赵洽丑妇赋》统一书写,这几种文献当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

P.3821

小册子,共 20 叶,半叶 6-8 行,行 11-18 字不等。全部由一人书写。依次抄有《百岁篇》(《缙门百岁篇》、《丈夫百岁篇》、《女人百岁篇》),《百岁诗拾首》,《十二时行孝文一本》(有《十二时》4 首,3、4 之间夹有“六十甲子纳音”),曲子(《感皇恩》、《苏幕遮》、《浣溪沙》、《谒金门》、《生查子》、《定风波》),《晏子赋一首》。其中,《晏子赋》在最后 4 个半叶,首全尾缺。书写格式上,皆有首题,自《十二时》起,篇题在上一文献最末一行内书写,当为节省纸张之意。楷体,较拙,文字大小基本统一,行间加有校字。

P.3821 除《晏子赋》以外,均为完整文献。整册虽然字迹不够端正圆润,但格式较统一、书写较认真,其中还有行间校字。本册最初的《缙门百岁篇》无篇题,

①《瑜珈师地论手记》卷三十二下题有“沙门洪真”字样,卷背接缝处有“沙门洪真”朱笔签名 9 处,这些都表现出书写态度的认真。

②据颜廷亮《关于〈晏子赋〉写本的抄写年代问题》,此处的天成五年为后唐明宗时的 930 年,见《敦煌研究》,1997 年第 2 期,页 135。

最末的《晏子赋》未完,有可能是因为处于最外侧的册页散落。而《晏子赋》所占的4个半叶行数分别为7、6、8、8,后2个半叶的栏格只有7行,但文字压行书写而成8行^①,很可能是因为纸张不够而这样书写的。推测本册的书写者为具备一定知识水平的人^②。

Д X 00925(新号 1483)

为卵圆型残片。双面书写。正面为《晏子赋》,仅存开头部分不完整的3、4行。有界栏,楷体,拙,上下文字间距小。背面为习字杂写。楷体,拙。

由于残存文字不多,不能判断正背是否为一人所写。从字形来看,不是正式书写的文献。

BD00207v(字7)

共8纸,首尾断,经黄纸、研光。双面书写,书写者不同。正:《妙法莲华经》。背:《晏子赋》及若干杂写。

正面经文由一人书写,每纸28行,行17字,端润楷体。

背面为另外一人所写,文字集中于前三纸。文献依次为佛经杂写、《晏子赋》片断、习字杂写、佛经戒律杂写、习字杂写、礼忏文杂写、习字杂写。无天头、地脚,行格疏密不均,文字大小不等,字体粗拙潦草,用墨浓淡不一,有倒字。

BD00207 正面为唐代写经。而背面所有文献均不完整,随意穿插,颇为杂乱。以《晏子赋》来说,其中明显有多处脱字、讹字,且字迹潦草,至有两字之间无间隔而貌似一字者。从文献内容及其书写来看,卷背为杂写。

二、《晏子赋》的同卷抄写情况

以上描述了已知的9种《晏子赋》的基本情况。我们可以从文献完整程度、格式统一程度、书写工整程度等几个方面,对各个《晏子赋》的书写情况作一评价。《晏子赋》的完整程度,可分为三个层次:赋文完整;由于残损等外在原因而导致赋文不完整者;由于主观原因未完整书写者。格式方面偏重写卷中所有文献的格式是否统一,主要看各个文献是相对独立还是混杂书写,有无首题、尾题。书法方面看文字的字体是否规整、大小是否统一、行列是否整齐,以及用墨浓淡是否一致。对《晏子赋》抄写状况的评价,可大致定为三个等级:规范文献、习写、随意的杂写。

就《晏子赋》所在的这9个写卷来看,文献完整程度、格式统一程度、书写工整程度基本上是相应的,即完整的文献也往往有着规范的格式和端正的书写。这9个《晏子赋》写卷书写情况约略可分为三个等级。P.3716、P.2564中的《晏子

①从装帧形式看,本册在每叶中央对折,之后在折痕处装订;每叶划有界栏,中央折痕的两侧多数不对称,甚至有歪斜者,因此可以判断界栏在装订之前就已划好;而册中文字避开装订处,是在装订之后书写的。

②汤君:《敦煌曲子词写本叙略》,《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页196。

赋》均首尾完整,其格式和书写亦规范良好。P.3460、P.3821 格式、书写亦良好,惜《晏子赋》不完整。究其原因,目前可见的是因为写卷残损的客观状况:P.3460 为残卷,P.3821 可能残损或由于纸张限制而未完成。其余的几个写卷,Д x 00925 为残片,提供的信息很少;S.6332 文献未完,即有倒写杂字,可见其书写之随意;而 S.5752、P.2647、BD0207 在以上三个方面程度各自不同,但都表现出文献内容混杂、格式不一、书写不够认真的共同特点,可以认为这四卷中的《晏子赋》是习写甚或杂写。表示如下,同时标明与《晏子赋》同卷的其他文献:

卷号	文献	格式	书法	本篇评价	同 卷 文 献	
					相同书写者	不同书写者
S.5752	*	*	*	杂写	百鸟名	赵洽丑妇赋、百鸟名
S.6332	*	**	**	习写	无	无
P.2564	***	***	***	完整规范文献	龔虐新妇文、太公家教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略抄、百行章疏、白画鬼神、乙酉年残契约、辛巳年杂帐
P.2647	*	*	**	习写	五更曲、千字文习字	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P.3460	**	***	***	规范文献	无	杂写文字若干
P.3716	***	***	***	完整规范文献	王梵志诗、赵洽丑妇赋、百鸟名	瑜珈师地论手记、新集书仪
P3821	**	***	**	规范文献	百岁篇(缙门百岁篇、丈夫百岁篇、女人百岁篇)、百岁诗、十二时行孝文(夹有“六十甲子纳音”)、曲子(感皇恩、苏幕遮、浣溪沙、谒金门、生查子、定风波)	无
Д x 00925	*	*	**	不明	不明	习字
BD00207	**	*	*	杂写	杂写(佛经、习字、佛经戒律、礼忏文)	妙法莲华经

那么,为什么《晏子赋》会在流传中有这样的书写状况呢?对于写本来说,决定书写状况的最直接因素是书写者。但敦煌文献中书写人身份大多难以确定,《晏子赋》亦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从与《晏子赋》同卷的文献来找寻一些线索——它们是《晏子赋》的共生群体,体现出《晏子赋》存在与流传的文本环境。在敦煌写本中,一卷之中包括多篇文献的情况很常见。有的本就具有选集的性质,比如《文选》、《唐人选唐诗》,它们由编写者有意选取篇章并组织成集;有的则是某一类别文献的汇集,比如几种童蒙读物的“丛抄”^①;但是也有很多同卷的篇章并无明显的联系,很有可能是随意的杂抄^②。那么,《晏子赋》与它同卷的篇章之间会有什么关系吗?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同一写卷中?

①参看郑阿财《敦煌蒙书析论》,见其《敦煌文献与文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民国八十二年[1993],页237-276。

②参看林聪明《谈敦煌文书的抄写问题》中所举之例,页296-299。

在这9个《晏子赋》写本中,有7个都是与其他文献同卷抄写的。而同卷文献中由同一人书写的有:《𪛗𪛗新妇文》、《赵洽丑妇赋》、《百鸟名》、《王梵志诗》、《百岁篇》、《十二时》、《五更转》、曲子词(《感皇恩》等),以及《太公家教》、《千字文》十种,它们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按照文献的内容和体制,大致可将敦煌文献分为宗教典籍、社会文书、童蒙读物,以及文学文献(包括俗赋、诗、词文、曲子等)四类。而上述10种文献的种类相当集中:其中有8种文学文献,《𪛗𪛗新妇文》、《赵洽丑妇赋》、《百鸟名》为俗赋,《王梵志诗》为诗歌,《百岁篇》、《十二时》、《五更转》、曲子词为曲词;《太公家教》、《千字文》2种则为童蒙读物。我们暂且不作结论,而将同卷现象的范围稍微扩大,着眼于与《晏子赋》相关性较高的这10种文献,了解与它们同卷且由同一人书写的是哪些文献。

与《赵洽丑妇赋》、《𪛗𪛗新妇文》、《百鸟名》同卷、同书写者抄写的文献集中在文学文献和童蒙读物。俗赋、诗文如《晏子赋》、《酒赋》、《王梵志诗》、《十二时》,童蒙读物如《太公家教》、《千字文》、《崔氏夫人训女文》。

与《王梵志诗》同卷、同书写者抄写的文献以俗赋和诗文居多。如《晏子赋》、《赵洽丑妇赋》、《孔子共项诤相问诗》、《茶酒论》、《捉季布传文》。

与《百岁篇》、《十二时》、《五更转》、曲子词同卷、同书写者抄写的文献中,以词文最多,且多为佛赞曲词,如《出家赞》、《南宗赞》、《劝善文》、《十空赞》。

与《太公家教》、《千字文》这两种童蒙读物同卷、同书写者抄写的文献以童蒙读物最多,如《新集严父教》、《武王家教》、《千字文》、《百鸟名》、《百行章疏》;其次为文学文献和社会文书,如《晏子赋》、《𪛗𪛗新妇文》、《百岁篇》,以及书信、社司转帖等。

由上述所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印象:首先,这些文献基本以类相从,俗赋、词曲、童蒙读物经常与同类篇章同卷出现;其次,同卷文献若分属不同类别,这些类别也往往同现一卷。就第二点,我们可以从文献在应用中的特点来进一步地讨论。

三、《晏子赋》及其相关文献的同卷原因

就文献的数量来说,以上10种文献中《千字文》、《太公家教》、《王梵志诗》的出现多于30次,而其他几种文献的出现次数都少于10次,有的只有三五次。这些文献的数量与敦煌遗书中非佛经汉文文献的数千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些仅出现几十次甚至几次的文献,却能够比较多地出现于同一写卷,这恐怕还是因为它们有着一些共同之处。

某一文献的存在必然有其适用性。《晏子赋》以及与之同卷的这些文献,凭借着什么样的特性为时人所接受,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传播的呢?

从语言形式看,与《晏子赋》同卷且关系密切的10种文献,均以韵语为主,这一特点对口头的传播极为有利。口诵、吟唱的传播方式,一直就是与韵语相随的。而这韵语除了诗、赋之外,还包括记颂功德的铭赞之类。《千字文》、《太公家

教》的主要功用是童蒙教育,它们抑扬成韵,实为记诵之便。而其他的8种文献,在文体上为诗、为赋、为词曲,本就有着吟诵或者合乐的传统^①。这其中的《百岁篇》、《十二时》、《五更转》诸曲都采用乐章叠唱的方式,明显具有民间歌谣的特点。

从内容和接受者来看,尽管它们在内容上有着不同的取向,但其接受者都是广泛的社会民众。首先,《千字文》、《太公家教》为学童即需接触的教育读本,无论是识字,还是其中所讲述的历史故事、传达的儒家的伦理观念,都是社会要求的基本知识。可以说童蒙读物是面向所有社会人群的。其次是《王梵志诗》和《百岁篇》、《十二时》、《五更转》以及曲子词,它们在思想内容上都与佛教有关。《王梵志诗》传达“苦谛”^②,可以看作是诗歌形式的偈语;《百岁篇》、《十二时》、《五更转》等曲子也往往有人生匆匆营务忙的唱叹,并且常常为佛门所用^③。而这些诗歌曲词,又往往言语俗白、语义浅显。在唐五代佛教盛行的氛围中,它们在普通百姓中传播,也是自然之形势。与以上两类不同,《赵拾丑妇赋》、《赧赧新妇文》、《百鸟名》与《晏子赋》这几篇俗赋^④,却以戏谑与诙谐为能事。它们不登大雅而有类俳优,其中的嘲谑或者机智,也都为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

在实际的传播中,这些文献有着活生生的应用,它们的使用与文体本身的特点是不可分的。首先,通俗的韵语的形式使得它们不会局限于案头读物,而更可能以口诵方式表现出来^⑤。在中国俗文学发展的历程中,从先秦的采诗、两汉的乐府,到宋元话本和明清的戏曲,它们主要依凭口头的伎艺来表现,文字的记录往往用作曲辞、说话类表演的底本。其次,接受者的广泛,使得集体性的接受成为可能。如果在传播时不是一对一,而在有比较多的受众的情况下,传播的授受双方很可能会变成一方为宣讲者、表演者,一方为听众。这两个推论对曲子词、童蒙读物基本适用;诗歌虽因较强的个体色彩而不具有表演性,但也有口头传诵的特征。

以上的这些特点在《晏子赋》中也有所反映。关于表现方式,一方面,赋最初

①对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史书的记载反映出其配乐的特征。《史记·孔子世家》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汉书·食货志》言:“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②参看谢思炜:《唐代通俗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页159。

③参见辛夷:《读敦煌俗曲杂识》,《社科纵横》,1990年第6期,页3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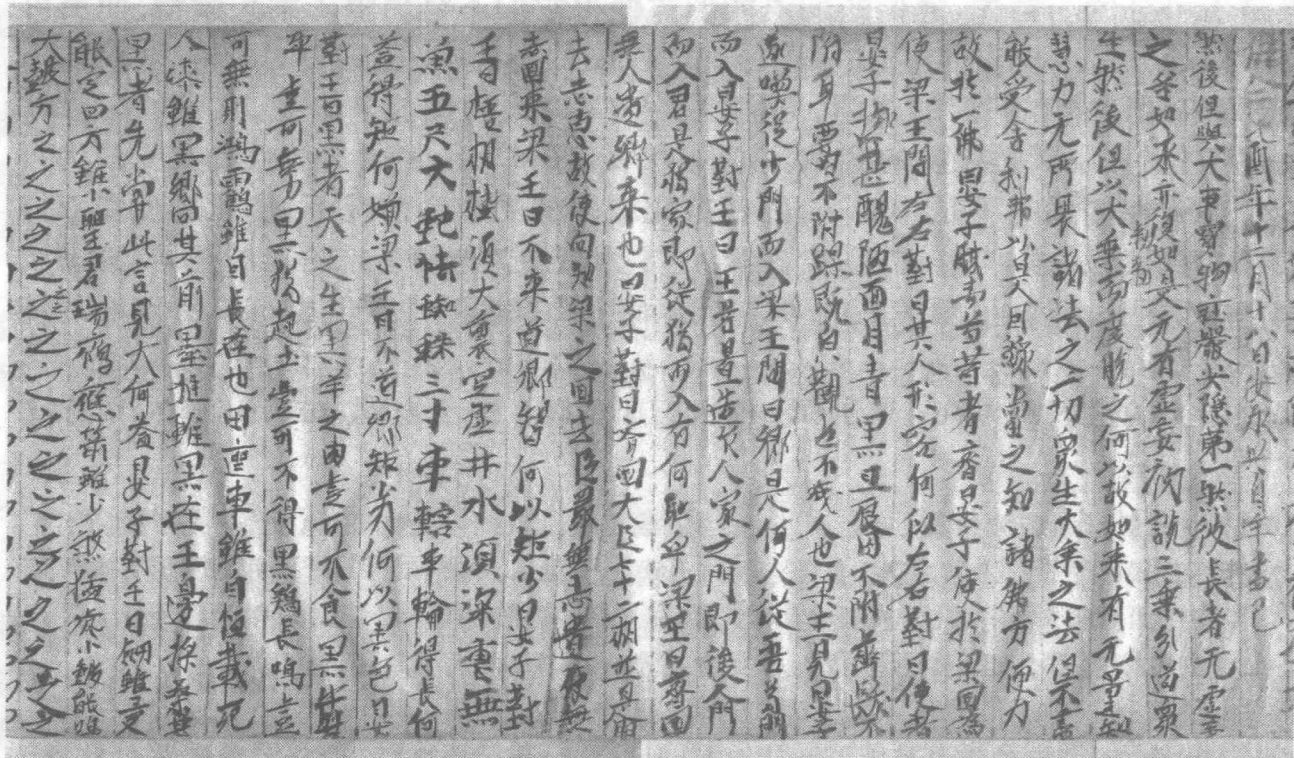
④《百鸟名》的类别归属有童蒙读物和俗赋两种看法,参见郑阿财《敦煌蒙书析论》,伏俊琰《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见其《敦煌文学文学丛稿》。从同卷情况来看,《百鸟名》更多地与俗赋同抄,因而本文亦归之于俗赋。

⑤王小盾《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强调“敦煌文学作为口头文学的特性”,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页115。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其类型初探》认为敦煌俗赋“并不是案头读物,而是与俳优表演关系密切的演唱脚本”,见其《敦煌俗文学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页16。

具有“不歌而诵”的口诵特征,并一直保留了散韵相间的行文方式。另一方面,现存9种《晏子赋》写本文字各有差异,这固然有俗字异写的因素,但相当多的同音讹误也很可能因为这是对口头语言的记录。关于表演性,首先要将赋与俳优联系起来。对二者的关系,前人论述已多,俳优往往以滑稽调笑的形象出现^①,他们的便给言辞往往是在现场随时道出,他们的伎艺在于滑稽娱人。其次,从唐代讲唱艺术的发展来看,俗讲盛行在唐末五代时期^②,这也是《晏子赋》的抄写时代。俗讲的体制有基本的两种:引用经文者,以说解与歌赞相间者^③。敦煌文献用于俗讲的,以变文、曲子词最为常见,然而当俗讲越来越多地演变成为一种伎乐时,具有娱乐性质的俗赋也很可能成为讲唱伎艺的脚本。

对于写本来说,书写的诸多环节影响着它最后形成时的面貌。敦煌遗书中普遍存在的同卷书写情况,要求我们对每一文献的书写情况分析之后,再对文献之间的相关性下结论。找寻与《晏子赋》相关文献,也是希冀从文本层面还原它在当时的使用状况。敦煌俗赋的发现指示了赋在民间的发展轨迹,而它与其他文献的共生状态,也为进一步研究赋与其他文体的关系提供了线索。

附录:国家图书馆藏《晏子赋》BD00207(字7)录文



①参见冯沅君:《汉赋与古优》,《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页78-94。

②颜廷亮《关于〈晏子赋〉写本的抄写年代问题》中以《晏子赋》为例说:“所有敦煌讲唱故事类文学作品,大约也都抄写于归义军时期,其中绝大多数似乎抄写于九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十世纪上半叶”,页138。

③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沧州集》,中华书局,1965,页2。

录文依照原卷文字,加入现代标点,每行文字之前的数字用以指示原文所在的行数。录文未做详细校注,着重对影响文义的讹误、异写加以标示。其中,误字、异写字在原字后的()中注明或说明,衍字加〈〉表示,脱漏之字在原字后的〔 〕中补出。

- 10.(前为杂字若干) 晏子赋壹首。昔者,齐晏子使于梁国为
11.使。梁王问左右〈对〉曰:“其人形容何似?”左右对曰:“使者
12.晏子极甚丑陋,面目青黑,且唇不附齿,发不
13.附耳,腰不附踝(胯)。既覩观占,不成人也。”梁王见晏子,
14.遂唤从少(小)门而入。梁王问曰:“卿是何人,从吾苟(狗)门
15.而入?”晏子对王曰:“王若置造〈乍〉人家之门,即从人门
16.而入。君是狗家,即从狗〔门〕而入。有何耻乎?”梁王曰:“齐国
17.无人,遣(遣)卿来也?”晏子对曰:“齐国大臣七十二相,并是〔聪〕
明
18.〈去〉志(智)惠,故使向知(智)梁(量)之国去。臣最无志(智),遣
(遣)使无
19.志(智)国来。”梁王曰:“不〈来〉道卿〔无〕智,何以矩(短)少
(小)?”晏子对
20.王曰:“梧桐树须(虽)大里空虚,井水须(虽)深里无
21.鱼,五尺大蛇怯蜘蛛,三寸车辖〔制〕车轮。得长何
22.益,得矩(短)何嫌?”梁王曰:“不道卿矩(短)劣(小),何以黑
色?”晏〔子〕
23.对王曰:“黑者,天之生。黑羊之肉岂可不食,黑牛驾
24.车岂可无力,黑狗起(趁)土(兔)岂可不得,黑鸡长鸣岂
25.可无则。鸿鸛虽自(白)长在也(野)田,丧车虽白恒载死
26.人。漆虽黑向其前,墨槌虽黑在王边,采桑甚(榘)
27.黑者先尝。〔方知〕此言见大(白)何益?”晏子对王曰:“劒虽三尺
28.能定四方,〔麒麟〕虽小圣君瑞应(原字书写错误,后一字为补正)
应,箭虽少煞猛虎,小𡗗(锤)能鸣
29.大鼓。方之(知) (后为杂字若干)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李际宁、黄霞、林世田老师为本文写作提出建议,谨此致谢。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